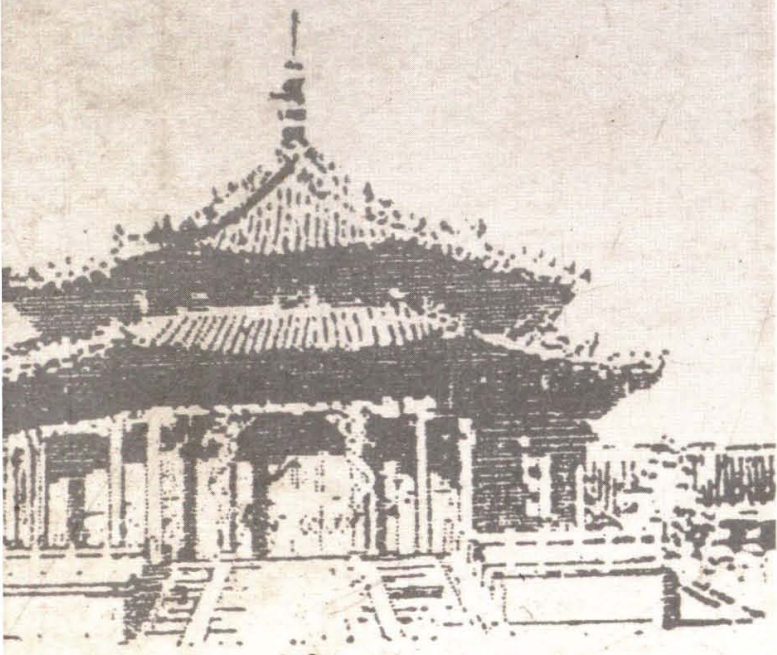


瀋陽文史資料

第二十四輯



沈 阳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四辑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2001年12月

沈阳文史资料第 24 辑
沈内登字第 54 号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沈阳市沈河区七纬路27号 邮编:110014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 印刷
印数:1500册 工本费:18.00元

目 录

- 沈阳锡伯族史略 关 方 (1)
- 锡伯族家庙太平寺 关 方 (35)
- 沈阳锡伯族故事传说 刘振操 (53)
- 沈阳西塔地区朝鲜族今昔 田太顺 金锡珍 (62)
- 沈阳民间文学概述(建国前) 刘振操 (67)
- 沈阳谜坛今昔掠影 王 岩 隐 庵 (98)
-
- 郝锡久的艺术生涯 王成奇 (103)
- 萧其宣生平记事 田 瑗 (114)
- 马刚烈士的生平事迹 王明志 赵荆山 (129)
- 抗日义勇军司令宋国荣 邓小溪 (133)
- 张作霖历史资料片断 张闾庸 (164)
- 记张作霖两次谈话 王香林 (171)
-
- 伪奉天市长赵欣伯 王国玉 (179)
- 伪奉天市长郑禹 王国玉 (191)
- 川村狂堂其人 齐守成 (205)
-
- 伪奉天军事部病院概况 张景德 (211)
- 伪陆军航空学校概略 张景德 (215)
- 伪奉天陆军卫生兵学校与卫生兵 张景德 (220)
- 美机 B29 空袭沈阳目睹记 张景德 (22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 沈阳见闻记 张景德 (229)
- 辽中县土地改革运动概述 杨振坤 (233)
- 辽中久才岗子土改动员大会 王兴华 (240)
- 记辽中县土改斗争中的两位贫农英雄 ... 李 展 于德大 (243)
- 沈阳东源染织厂 李志群 (247)
- 沈阳成发铁工厂 李志群 (256)
- 沈阳天平仪器厂 李志群 (265)
- 战功后面的无名英雄 李银杉 (275)
- 参加抗美援朝担架队的回忆 王德润 (279)
- 回忆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 姜明文 (287)
- 昆明作战人员训练班内幕 张屏夷 (295)
- 回忆我在成都起义经过 张屏夷 (297)
- 沈阳文史资料 1—23 辑目录 学宣文史办 (299)
- 后记 (336)

沈阳锡伯族史略

关 方

锡伯族不仅是一个勤劳、淳朴、勇敢、刚烈的民族，而且又是精骑善射，能歌善舞，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在祖国和睦的民族大家庭里，默默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概况

在古树参天、富饶美丽的兴安岭；在一望无际、绿野茫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波涛滚滚、鱼肥水美的嫩江流域，这便是锡伯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

锡伯族人民以青松的性格，顽强地生活在高寒北国。他们不但要战胜雪虐风饕的严寒，还要和凶猛的野兽拚搏。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以智慧和胆略，使这个为数不多的民族变得非常膘悍、勤劳、质朴……他们热爱和向往美好的生活，勤于开发，善于创造和保卫自己的家园。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使锡伯族人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艰难险阻，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方能得以生存……所以锡伯族人的心胸象大草原那样开阔，性格象万年松一样刚强，心灵象山花一样美丽，对朋友以诚相见，视友谊如珍宝。这些优秀的传统世代相传。纵观历史，古往今来，锡伯族人民总以大局为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与其他民族水乳交融，休戚与共，和睦相处，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从十七世纪开始，锡伯族逐渐南迁到吉林、辽宁、北京、山东等地，于公元 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选调

锡伯族官兵连同家属四千余人戍边到新疆伊犁。现在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人民,就是当年西迁的锡伯族后裔。公元 1769 年(乾隆三十四年)清政府又一次从盛京(沈阳)等地选调锡伯族兵一千人到云南边境抵御外患,守卫着祖国的南大门。因此,现在云南境内尚有锡伯人。

锡伯族人民不仅擅长骑马射箭,还业精于学,不断提高和改革农业技术,清朝时期的“锡伯米”即颇有盛名。

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悠久的文学艺术,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说唱……是祖国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株芳香艳丽的鲜花。

由于历史原因,锡伯族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民族。据 1982 年国家统计数字表明:全国有 83629 人,其中分布在辽宁省 49380 人,新疆 27380 人,黑龙江省 2621 人,吉林省 1559 人,其余散居在祖国各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与其他民族人民一起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正信心百倍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沈阳市锡伯族分布情况

沈阳市是多民族聚居的一个古城,在全市 400 多万人口中,锡伯族占有 26000 多人。这些人的祖辈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从吉林、黑龙江迁移来的。但也有在清康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和早在顺治年间迁移来的。现在他们散居在市内各区。据 1982 年国家统计数字,居住在和平区的有 566 人,沈河区 540 人,大东区 804 人,皇姑区 658 人,铁西区 686 人,东陵区 684 人,于洪区 4189 人,苏家屯区 1427 人,新城子区人口最多,为 16493 人。从人口分布可以看出,锡伯族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他们居住在远离闹市区的东、南、西北的低洼平地,在那里辛勤

地耕耘着。

锡伯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在解放前历经沧桑,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解放后,锡伯族人民才获得了新生,做了国家主人,政治上享受平等权力,从全国到省、市、区人大、政协都有锡伯族代表参加,他们与各族人民一起共商国家大事。1983年4月,在新城子区成立了兴隆台锡伯族乡人民政府。于1984年又在黄家乡成立了黄家锡伯族乡人民政府。于1985年又将兴隆台锡伯族乡改为兴隆台锡伯族镇。由于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帮助锡伯族乡、镇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使民族乡、镇的贫困落后面貌得到了较快的改变。居住在市区的锡伯族,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有的当了学者、教授、工程师、国家干部……他们奋战在工业、教育、卫生、美术、艺术等各条战线上,为振兴沈阳辛勤工作。

锡伯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有着光辉的历史。为了更好的较全面的了解沈阳市锡伯族情况,必须先追溯一下锡伯族的族史。

锡伯族族源及族名

锡伯族是一个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民族。它是古代东胡的一支拓跋鲜卑的后裔。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东胡就居住在我国东北方。它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过着狩猎的游牧生活。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部落联盟逐渐强大,并开始发动掠夺战争。在战国时期,对附近的燕国、赵国曾多次进行侵扰,就是对匈奴部落也是兵戎相见,最后终在西汉初年被强盛起来的匈奴族所击破。

东胡部落联盟解体后,部落中的一些民族,乌桓、鲜卑不得不臣属于匈奴,并北迁辽东塞外。

匈奴统治了大漠南北以后,不断南下攻汉,因此汉朝初年不得

不采取防御政策。到汉武帝时,派卫青、霍去病为大将,多次进军漠北,大败匈奴。由于匈奴受到西汉大军的攻击,势力渐渐衰弱。到东汉公元四十八年时,匈奴开始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于一世纪末被东汉击败后西迁,南匈奴归附汉朝。

由于匈奴的衰败迁徙,才使乌桓、鲜卑解脱匈奴的统治,并逐渐强大起来,占领了大漠南北(公元207年乌桓族被曹操所破,一部分被迫进入中原,一部分塞外乌桓人融合于鲜卑)。

鲜卑部族史书上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其中包括宇文氏、慕容氏、段氏)。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在天然资源丰富的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一带。嘎仙(善)锡伯语村屯故乡之意。嘎仙洞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据史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远祖“毛”以上“积六十七代,世为君长,统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到“毛”时,由于他“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毛”以后到第五代大约在东汉初年,拓跋鲜卑在“推寅”(意为钻研)带领下,从大兴安岭北部的大鲜卑山往南迁徙。在迁徙中遇到了千岩万壑,重峦叠嶂,历尽凶险,在林荫蔽日,古木参天的兴安岭里艰难的跋涉着。后在“瑞兽”引导下才走出大兴安岭南迁到了大泽(今呼伦湖)。在大泽住了七代又开始南迁,途中遇到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行,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这里讲到的“神兽”与上面说的“瑞兽”是一种动物。头上“角有数歧似鹿非鹿,蹄分两瓣似牛非牛,头生尖耳似马非马,身长长毛似驴非驴”它能在原始森林沼泽地里自由行走,而不陷落,而牛、马牲畜就不行。因此拓跋鲜卑称之为“瑞兽”。实际此兽属鹿类动物。

拓跋鲜卑南迁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整日扬鞭飞马，提弓携箭，过着渔猎游牧生活。

由于居住大漠以南，与汉人接触机会多了，受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使拓跋鲜卑很快强大起来。“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为了报复和掠夺，便经常与匈奴、东汉进行战争，这又促使拓跋鲜卑必须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公元258年，已经组成了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公元308年，“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成为塞上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15年，拓跋鲜卑在盛乐一代（今内蒙古中部和山西北端）建立政权，国号为“代”。但在公元376年被秦苻坚出兵击灭，前秦于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失败后，政权瓦解。公元386年，拓跋珪乘机复国，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之为北魏（也有称为后魏、拓跋魏、元魏）。公元397年拓跋珪率大军攻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占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正式称皇帝“魏道武帝”，即之吞并后燕、夏、北燕、北凉。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境逐渐扩展到秦岭、淮河，从而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朝十六国的争战局面。

在鲜卑拓跋部从呼伦湖决定南迁时，考虑到迁徙的艰辛，迎接他们将是残酷地战斗。为了占有这土地肥沃，水草茂盛，物产丰富的大草原，为了看管好嘎仙洞祖庙，只好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拓跋鲜卑留下继续驰骋在大兴安岭北、嫩江流域、呼伦贝尔一带。一部分拓跋鲜卑继续南迁。继续南迁的鲜卑拓跋氏经过千辛万苦历经百战，终于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公元443年3月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一队人马回老家嘎仙洞祭祀祖先。他们“于

7月25日这天以最高祭祀礼置马牛羊三牲为供,举行了祭祖祭天的盛大典礼,然后将祀文刻于洞内石壁留念。”

由于留下这部分拓跋鲜卑能经常回到嘎仙洞扫祭,才使祖庙“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他们虽然还过着游牧生活,以打渔狩猎为业,但也开始兼营畜牧业和农业。从北魏开始,史书上把这部分拓跋鲜卑称之为室韦,因居住在室韦部的南端,故又称之为南室韦,也有写成室韦的。到元朝时,又称为失比,明清时期,称之为西焚、西北、席北、席百、锡伯。这些音似字异的名称,主要是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远离中原的南、北方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的贬义称谓。南方称之为“南蛮”,北方呼之为“鞑子”锡伯族正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史书上对族名读音的记载也不详加考究,加之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不同,便出现了许多音似字异的名称。因此,一个民族就出现了多种称谓的现象。

“锡伯”一名,第一次载入史册的时间是在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当时,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为了扩大疆域,便对周围的部落进行攻击吞并。邻近的部落为了抵御建州女真部的攻击掠夺,必须联合起来反抗,于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九月,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珠舍里、纳殷、科尔沁、锡伯、卦尔察共九个部落,组成三万余人的联合大军进行抵抗,结果被努尔哈赤击败了,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九国之战。从此以后,历史文献上一直以“锡伯”这一词来称谓。

锡伯族被编八旗及南迁盛京

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后,为了巩固他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必须首先征服骁勇善战的东北各打牲部落。为此,努尔哈赤对他们采用了利诱和威逼并用的手段,迫使这些人归

服他。据史料记载：公元 1588 年苏完地区锡伯族部落长索尔果和他的儿子费英东率领五百户投降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见费英东勇猛善战，便封他为一等大臣，并将其长子褚英台吉的女儿嫁给他，努尔哈赤对自动投诚的锡伯人给予高官厚禄，并与部落的贵族联姻，免除一切杂役，这样做，是想诱使更多的锡伯族归服于他，如果不归服，就诉诸武力。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的势力更加强大，公元 1616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登极称汗，建立金国，史书上称之为后金。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附近的一些部落慑于努尔哈赤的武力，便自动来归附，其中也有部分锡伯族人。据史料记载锡伯部巴达纳率了三十名来投，努尔哈赤封他为备御。还有锡伯族胡岱、巴珠、格卜库等人携妻子来投，努尔哈赤命其子孙世代勿令当差。尽管努尔哈赤对投诚的人给予奖赏，但锡伯族归服的并不多，直到后金天命、天聪年间，科尔沁等部归服后，锡伯族才随之归服。清政府于崇德元年（公元 1636 年）、顺治五年（公元 1648 年）将科尔沁编入蒙古八旗，锡伯族也随之编入蒙古八旗。八旗分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兰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兰旗。是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由努尔哈赤创建）。后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控制。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八旗子弟都可以被选当兵，即八旗兵，八旗官员平时管理民政，战时充当将领，锡伯人在八旗中只能任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末职。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公元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间的东部边界。公元 1690 年（康熙二十九年）

噶尔丹率军东侵,抢掠大漠南北,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入侵和噶尔丹部的劫掠,决定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防务,在齐齐哈尔、松嫩二江汇合处筑城驻兵,在其它各地也加强兵力。

清政府为了解决兵源不足,决定从科尔沁蒙古八旗中抽出骁勇善战的锡伯兵编入满州八旗。清朝皇帝为了能直接控制这支强兵,于公元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把锡伯编入满州上三旗,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和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等处驻防,从此,锡伯族全部被置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下。

清政府为了使勇猛异常的锡伯族分化瓦解,削弱民族力量,把锡伯族又分为新旧满洲。对自动投诚的锡伯人称之为“佛满洲”即“旧满洲”,对九国之战征服的锡伯族称之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这种不同的名称,造成了民族内不同的等级,使民族内部陷于分裂。

清政府迁入北京后,盛京兵力空虚。加之八旗子弟日渐衰败,清康熙皇帝考虑到盛京地处要地,又是清王朝的“留都”,必须增加兵源,加强防务力量。锡伯族虽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东挡西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得不到清朝的信任和重用,反而对锡伯族忧心忡忡,认为锡伯族原是北方的打牲部落,性勇猛刚烈,加之骑马射箭娴熟,如果让其久居北方,远离京城,唯恐日后闹事不好控制。盛京正好需要补充兵力,正是将锡伯族分散各境的好时机,于是公元1699年到1701年(康熙三十八年到四十年)强行将锡伯族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分批南迁到盛京。据《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记载:迁入盛京的锡伯族除留下一部分驻守盛京外,其余被分散到开原、铁岭、兴京、辽阳、牛庄、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城、广宁、锦州、宁远、义州、巨流河、小凌河、白旗堡、

小黑山、阳驿、中前所、中后所等处驻防效力。与此同时，又将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其余锡伯族南迁到北京，山东等地驻防。这样既解决了清政府兵源不足，又达到了对锡伯族“万不可使居一国”强制分散，“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

锡伯族迁入盛京(沈阳)后，由于分散各地驻防，自己不能独设牛录，只好与其他兄弟民族杂居错处，用自己的双手很快建立了家园，由于勤劳好学，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并在外攘关门外(现址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一段太平里二十一号)大家集资建立了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从而锡伯族有了集会、祭典、娱乐的公共场所。

锡伯族西迁

十八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一方面侵略我国北部的黑龙江流域，另一方面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的西北部，准喀尔部贵族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叛乱，维吾尔族大小和卓也相继叛乱，乾隆皇帝决定出兵西北，于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和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先后平定了准喀尔部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参加平定叛乱的八旗兵中就有许多锡伯族士兵。

公元1758年10月(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爱新觉罗弘历皇帝在上谕中说：“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伊犁则必需大兵驻防”所以平定叛乱后，在到处是“千里空虚，渺无人烟”的情况下，乾隆皇帝立即派遣将军大臣到新疆伊犁一带治理边防军务并先后从黑龙江、热河、凉州等地调兵防守边塞。但沙皇俄国仍然虎视眈眈，侵占伊犁之心不死。清政府为了加强西北的军事防务，准备在伊犁东北方的塔尔巴台驻兵。伊犁将军明瑞深感兵力不足，向弘历皇帝请求增派锡伯族官兵，“闻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族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

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挑选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清政府对明瑞的奏称正中下怀,因为锡伯族忠勇善战,可以抵御沙俄的侵略,另外几个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还可以相互牵制,以免闹事。于是从盛京及所属凤城、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抚顺共十五个城镇选调骑射娴熟、骁勇强悍的锡伯族官兵 1020 人。盛京将军舍吐肯、丰盛额在奉旨挑选并安置遣往的锡伯族官兵奏折中写道“……于正月二十五日奉旨接后,臣等当即予为准备,由盛京所属各地锡伯族官兵之内,视其户口精简,年富力强,马背技艺谙练,又能放围狩猎者,捡选 1000 名……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每户发给整装银三十两,应发帐蓬、铁锅之折价银六两,马六匹,牛三头,车一辆,其家属自备两个月口粮。”(注:《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

奉命西迁的锡伯族,满腹愁肠,他们匆忙地准备着行装。首先装好吉祥的喜利玛玛和造福的哈尔堪玛法,到伊犁要保佑子孙繁衍安康,保佑六畜兴旺。“带上如金似银的南瓜子”,以便在征途路上好充饥,带上故乡的红高粱种,让它结果在西藏的土地上。“必需的用品全带上,要为今后的生计着想。”锡伯族人民面对艰难严酷的现实,虽有离别苦,但并不悲伤,而是以集体的智慧战胜困难,以寻求以后的生存。

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 4295 人,分成两队分别由盛京镶黄旗协领阿木胡朗、熊岳城协领噶尔赛代领,于 4 月 10 日和 4 月 19 日起程。在 4 月 18 日这天,锡伯族同胞聚集在太平寺家庙杀羊祭奠祖先,大家眼含热泪,共同追念父辈的恩泽,焚香请求祖宗保佑平安

……然后设宴为远征的亲人饯行。据记载饯行宴上,大家悲痛欲绝,以后再喝不到家乡的酒,吃不到家乡的饭,同根同族从此再也不能同桌共餐,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声音,以后相见只能在梦里……人间的不幸莫过于骨肉同胞的生离死别。丰盛的酒饭一口也咽不下,满腹的别言一句也说不出,“骨肉同胞顿足牵衣,无言唯泣……”

天性服从调遣,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锡伯族兵民为了守卫祖国的西北边塞,忍受着离别的痛苦,于4月19日晨,扶老携幼,最后看一眼故乡的一草一木,然后告别亲人。“我们去守卫祖国的边防,骨肉同胞再见吧,不要难过悲伤,擦干你们的热泪,祝福我们平安吧!”

英雄的锡伯族人民离开了多年劳动生息的家园,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们出盛京(沈阳)后,直奔彰武台边门,在西北方向沿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西行。一路上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餐风饮露。由于清朝官员克扣饷银,沿途上得不到给养,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艰难地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于同年8月24、25日到达乌里雅苏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由于蒙古位于内陆高原,那里的气候冬季长达半年以上,尤其西北部许多地区终年积雪。因此,乌里雅苏台的八月末气候已是寒气袭人,青草干枯的冬季了。由于蒙古高原的气候变化剧烈,牲畜没有饲料,无法行走,只好在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等来年春暖草青之季再继续前进,但在此休整期间,牲畜由于长途乘骑驾驶,又缺少饲料喂养,加之瘟疫流行,造成大量死亡。锡伯族官兵都携带着老小,没有牲畜作脚力,在漫漫的征途上很难到达伊犁。通过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每两户给马一匹,驼一峰,到伊犁后,照数交还。

锡伯族官兵借到牲畜后,带上口粮和茶叶,携着眷属,于公元1765年(乾隆三十年)旧历三月初十仍分做两队相继起程往伊犁进发。当走到科布多一带时,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具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稍退,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多受困数日,所剩兵丁之口粮只足月余之食”(注: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明摺档)从乌里雅苏台借的牲畜也倒毙很多。在这粮食将尽、畜力不足、道路又崎岖艰难的情况下,清朝领队官员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强迫锡伯族兵民继续前进,后来连发霉的面粉也吃不上,锡伯族官兵与家属只好采挖“株木耳(一种野菜)”充饥。单薄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褴褛的布片裹着疲惫的躯体,途中出生了550余名婴儿,没有衣衫,只好用路边的枯草当襁褓,皮包着骨头的母亲乳房干瘪,只好嚼野菜汁来喂养婴儿。一些人由于日夜兼程,加之饥饿,劳累成疾,还没有到达伊犁驻地,就离开了队伍,长眠于征途上。为了不把亲人的遗骨扔在异乡的土地上,只好含悲把亲人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入泥坛中带走,以便60年后带回老家盛京(沈阳)安葬(因清政府曾对西迁的锡伯族许下诺言,在伊犁地区只驻防60年,期满后可以返回原籍,其实这只是一个骗局)。英雄的锡伯族人民以顽强的意志,忍饥挨饿,挣扎着前进……最后终于在公元1765年(乾隆三十年)7月20日、22日两支队伍先后抵达伊犁。

锡伯族震古烁今的西迁,距今已有二百多年,这在当时交通工具非常落后情况下,道路又非常的崎岖艰险,锡伯族人民为了战略上的需要,扶老携幼,冒着酷暑严寒,跋山涉水,在沙石击面、风雪狂虐的沙漠和草原中,忍受着饥渴、冻病的折磨,从世代居住的沈阳,迢迢万里,昼夜兼程,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只用一年四个